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民国时期伊斯兰教 汉文译著研究

Chinese Islamic Litera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马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民国时期伊斯兰教 汉文译著研究

**Chinese Islamic Litera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马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研究/马景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4. 3

(宗教学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5749-9

I. ①民… II. ①马… III. ①伊斯兰教-传播-研究-中国-
民国 IV. ①B9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4794 号

· 宗教学理论研究丛书 ·

民国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研究

著 者 / 马 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编辑 / 范 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0.25 字 数: 64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749-9

定 价 / 12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周燮藩*

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按学界通论，以唐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大食始遣使朝贡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据实论之，唐宋时期进入中国的穆斯林，无论是商贾工匠，还是使节士兵，均为侨居中土的“蕃客”，其后裔称“土生蕃客”，甚至“五世蕃客”。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尚是教名未定，教义不明，不见于典籍，亦无汉文著译，基本上是侨民的宗教。蒙古西征后，东西交通大开，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大批来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他们在元代被称为“回回”，属色目人，政治地位较高，“仕于中朝，学于华夏，乐江湖忘乡国者众矣”（王礼麟《原集》卷六）。因此，时人评论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元代各地也普遍兴建了清真寺，形成“回回遍天下”的历史格局。来华的穆斯林中不乏才俊英杰，他们带动了双方的学术文化交流，有的带来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学药物、火炮建造等科技文化，而有的则崇儒学、通经书、能文善诗，精于书画，为中华文化带来瑰丽独特的气质，增添了绚丽斑彩的一页，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伊斯兰教得到普遍传播的同时，却难见翻译经典、阐扬教义的记载，仅于碑铭之中偶见一二。至明代，大部分穆斯林以汉语为共同生活语言，同时为保持民族文化传统，为了改变“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现状，胡登州在陕西咸阳倡办经堂教育，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经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一些经师尝试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研究员，知名伊斯兰教研究专家。

用“书字”翻译经典教材。随即这种汉文著译活动逐渐得到穆斯林的认可和重视，自明末至清末，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穆斯林学者，如王岱舆、张中、伍遵契、马注、刘智、马复初、马联元、蓝煦等，刊刻了许多被称为“汉文经典”的伊斯兰著译，如《归真总义》《四篇要道》《归真要道》《清真指南》《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天方正学》《清真释疑》等。刊刻这些汉文著译的目的，是要“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不但他教之人无所疑议，即教中之游移莫定者，亦可感发其天良，坚定其志气，永守祖训于不衰”（《清真释疑·马廷辅序》）。“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晓，即儒教诸君子咸知吾教非杨墨之道也”（《四典要会·马兆龙序》）。对教内而言，要改变“教义不彰，教理不讲”“于教礼之义旨趣味则未识”的状况，使穆斯林通过汉文著译更容易地阅读经文献籍，遵奉教规礼仪，排斥异端，维系正统的信仰。对教外，则“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天方正学·自序》），即增进主体社会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减少种种隔阂和误解。可以说，这是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社会经济发展后产生的文化自觉，既是振兴传统信仰，自强图存的宣传活动，也是主动与主体社会和主流文化沟通、交融的护教活动。

明清时期的汉文著译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献的核心部分，其中最具现实意义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苏非神秘主义为基础的伊斯兰教认主学，即新教义学，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宋明理学相会通，称“天人性命之学”，或“理学”，如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刘智的《天方性理》《真境昭微》，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复初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汉译道行究竟》等；二是以伊斯兰教法与儒家礼仪或社会伦理相附会，称“敬慎持身之道”或“礼法”，如刘智的《天方典礼择要解》、马注的《清真指南》、伍遵契的《修真蒙引》、余浩洲的《真功发微》、马复初的《礼法启爱》等。在著译中，穆斯林学者一方面申明，他们都是“采精挹萃，辑数经而为一经”（《天方性理·袁序》），“其中理道，悉本尊经，参以典籍，不敢自徇胸臆，毫发增损，间于诸家”（《正教真诠·自叙》）。同时，他们又表示，“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

而义无不同”(《天方正学·自序》)。在著译中,“恍然有会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也”(《天方性理·自序》)。“中西同此性理”“教虽不同而天人之理无不同”(《性理本经纂译·序》),“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天方典礼·自序》)。当时的官员儒生也有为书作序而对此大加赞赏:在诸教之中,“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正教真诠》叙)。“其伦礼纲常,犹然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也;其修齐诚正,犹然孝、弟、忠、信、礼、义、廉、节也;其昭事上帝,有所谓念、礼、斋、课、朝五者,亦犹然顾谥明命,存心养性,以事天也。夫然后知清真一教,不偏不倚,自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天方礼经序》)。由此看来,这些“以儒诠经”“附儒以行”的“回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遵中国之理,引孔孟之章”,融洽、会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素材和义理,用来阐发伊斯兰教的教理奥义和教法制度,成功地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出色地推动两种文化的沟通和结合,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

正是因为汉文著译活动在明清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自晚清以来,对汉文著译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民国学者陈垣、金吉堂、傅传统、马以愚、白寿彝等都有相应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再度开展,汉文著译也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90年代初,研究各宗教的学者共同参与编写了《中国宗教纵览》,伊斯兰教部分由我撰写,在这部分内容中,我对明清时期伊斯兰教的汉文著译活动作了比较全面的概述,并指出尽管“以儒诠经”是穆斯林迫于社会环境而采用的方式,其自保自存的目的也势必如此,但这些著译毕竟对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作了成功的尝试。然而,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学术研究的范围,我认为在清末,更具体地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花湛露翻译的《天方道程启径浅说》一书问世后,明清时期的汉文著译活动显然已经接近尾声。民国时期的穆斯林专著或译作当时尚未有

深入的研究。直到2000年以来,我主持编纂“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其中伊斯兰教的历史文献《清真大典》,共25册,200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该套典籍几乎涵盖了明清时期所有伊斯兰教汉文著译,同时也收录了民国穆斯林学者王静斋、杨仲明、马坚、金吉堂、马以愚、傅统先、白寿彝、纳忠、唐易尘、王国华、金殿桂、马天英等以及基督教传教士季礼斐、梅益盛等人的关于伊斯兰教的作品。对于出版这套典籍的学术价值,我在《清真大典》前言中指出:“对于了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正确理解宗教和民族的关系,特别是伊斯兰教和我国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关系,探索伊斯兰文化的特点,尤其是伊斯兰教与我国主体社会和主流思想的会通和融合,穆斯林学者在历史上所作的艰辛努力,并对推动宗教学的学科建设,撰写中国宗教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回族史、中国思想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虽然《清真大典》收录了部分民国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著译,但是,我并未对此做出界定和看法,好在马景在跟随我读博士期间,通过阅读《清真大典》和民国伊斯兰教的刊物,对民国时期的汉文著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以此基础上撰写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毕业后,又以《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思想研究》成功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经过几年的增补,调整框架结构,反复修改,顺利结项。结项后,他仍继续不断完善修改,并增加了新的资料和内容。

我曾经说过,就学术积累而言,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在我国的伊斯兰教研究中是开拓最早、成果最多的领域。但在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中,民国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虽然已有不少学术成果问世,但相比较而言仍是一个有待继续耕耘的领域。从历史上看,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一方面,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震撼,以致逐步解放。同时,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背景下的种种外来主义和思潮,也在不断涌入,形成新旧思想和不同主张的交锋与争辩,在中国社会出现思想空前活跃的局面。各个阶层,各种宗教和民族,都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面对着历史的抉择。中国穆斯林知识精英,在“五族共和”和“信教自由”的激励下,积极介入社会变革乃至宗

教改革的思想论战中，在争取社会进步、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抵抗外侮等问题上，深明大义，不落人后，显示了中国社会的主体身份和进步立场，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另一方面，世界伊斯兰教在西方社会的冲击下面临着危机和挑战，由此产生了各种改革思潮和宗教运动，一直影响着中国伊斯兰教的变革和发展。近代以来兴起的伊斯兰现代主义、伊斯兰传统主义（瓦哈比运动）和新苏非主义等，在中国伊斯兰教内均能看到不同的回应和发展，比如中国穆斯林新式教育的倡导、新兴教派的出现、对门宦的改革和批判等。在内外两方面的背景下，民国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呈现出一幅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瑰丽景象，不仅人物众多，而且地域分布极广，文献资料繁多，为中国近代宗教史和思想史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因此，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国伊斯兰教，我们可以重新回顾民国以前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发展的脉络，将其视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借助历史的镜子，清晰地看到中国伊斯兰教在现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

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正如马景所感受到的，领域太大，资料繁多，尚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全面的梳理和概述、深度的分析和评价等还有待来日。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一个切入点作为研究的起步。这就是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译。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专著，就是这一专题研究的学术成果。仅从书后附录的中外文献，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资料之浩瀚，内容之丰富。当时报刊论文数量之繁，传教士译、著作品之多，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而马景所做的扎实工作也令人赞叹。从该书所收集的著译来看，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马景的结论是，“在很多方面超过了明清时期”。对此，马景并没有止步于罗列这一时期的著译者和书名，而是从宗教史和思想史的角度，作了初步的分类和解读，列举了教务维新、教育思想、国家与国民、明真释疑、文明对话和学术研究六个方面。这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马景的这本著作在其本身的学术价值之外，还有一个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同道者介入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对于马景的研究和这部著作，我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他约我为他写序，我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但对他的求学精神，我还是有所了解。他对学问的执着和专注，治学严谨和勤奋。这使我非常感动。学精于勤，学成于专，这两句话都适用于他。我相信，他现在的成果，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照此以往，前途无可限量，将来必有大成。谨以此话作为勉励。是为序。

序 二

余振贵*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传入我国已经有 1000 多年的历史。然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伊斯兰教的研究起步很晚，大概肇始于清末，民国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中国伊斯兰教文献著译的核心部分是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产生的各种史料、文件和用汉文写作的著译作品，包括在新疆地区流传并以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伊斯兰教文献著作。从历史角度来看，在新疆地区流传的用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伊斯兰教文献，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在维吾尔族等穆斯林中的影响和个性化发展，是中国伊斯兰教文献著译中熠熠发光的明珠之一。而为数众多的汉文译著，则发源于明末清初，它将伊斯兰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丰富了伊斯兰教理论，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思想史输入了新的观念，充实了中华文化宝库。可以说，清代汉文译著既是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本教材，同时从事译著的学者也是设席讲经的一些有造诣的经师，因此，汉文译著创作活动并非单纯的宗教活动，它还是清代以来中国穆斯林思想家代代相续的一种有代表性的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活动。

(一)

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著译活动始于何时，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受民国学者金吉堂、白寿彝等前辈观点的影响，一般认为

*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顾问、知名伊斯兰教研究专家。

王岱舆是开汉文译著先河的一位高水平理论家。他的第一本著作《正教真诠》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南京完成，另一部作品《清真大学》也在此前后完成，而记述他言谈的《希真正答》，则由门人伍连成等在其去世之后编撰出来。然而，近年来，随着新文献的不断发现，有些学者就“王岱舆是最早的汉文著译者”的说法提出商榷。事实上，王岱舆著作正式问世以前，在东南沿海穆斯林中曾流行过《省迷真原》和《证主默解》这两种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特别批评这两本著作属于道听途说、妄自纂编、精于文翰而鲜于经义的“异端之学”。另外，崇祯九年前后，詹应鹏编撰的《群书汇辑释疑》已经问世，王岱舆曾在书中也多次引述。崇祯十一年南京穆斯林学者张中著成《归真总义》一书。因此，从时间来看，王岱舆似乎不是最早的汉文著译者，但是从社会影响力来看，明末清初以来他的著作在穆斯林中的影响是深远的，是巨大的。同时他是比较系统地用汉文译著伊斯兰经典的学者。在他之前，自唐代杜环第一次用汉文把伊斯兰教义扼要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起，就不断有一些穆斯林文人、学士在书籍、文献、家谱或为清真寺撰写的碑文中，借助儒、佛、道三家的术语表达过伊斯兰教教义，但这些论述只限于对伊斯兰教教义作一般性的介绍，尚谈不上深入的探讨或研究。到了王岱舆时代，江南穆斯林学人中就已经出现用汉文著述伊斯兰教教义的强烈呼声。虽然这种现象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必然趋向，但是真要实行起来，还是受到了很多固守传统的人士的非议。为了应对这种压力，王岱舆曾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护，他认为文字就如土木，纯粹是一种建筑材料，可以用来建清真寺，也可以用来搭盖佛堂，正道和异端可以各取所需，其功过不在材料，而看使用的目的。他举例说，当年为了使阿拉伯人接受伊斯兰教，真主用穆罕默德所使用的阿拉伯语颁降了《古兰经》，这是伊斯兰教适应风土人情的优点。现在我们用汉字来译解经典文籍，也是根据中国的风土人情，这丝毫不违背伊斯兰教宗旨。通过王岱舆和许多志同道合者的努力，终于使中国穆斯林基本上接受了以汉文译著伊斯兰经典文籍的形式，并乐于推动其发展。

继王岱舆之后，江南汉文译著活动逐渐在南京开展起来，顺治十年

(1653年)张中完成译著《四篇要道》，伍遵契相继翻译了《归真要道》《修真蒙引》，马君实编译有《卫真要略》，武昌人马明龙著有《认己醒悟》，山东济宁的马伯良翻译了《教款捷要》。稍后一点出现的穆斯林译著家有云南保山人马注，他作的《清真指南》洋洋洒洒20余万言，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文辞优美，一直被作为各地经堂教育的汉文课本。其同时代人尚有南京的刘三杰著《清真教说》，后人还伪托《回回原来》一书为其所著。刘三杰的儿子刘智，秉承父志，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五更月》《天方字母解义》等重要著作，成为清初的一位著名穆斯林译著家。山东人黑鸣凤还为《天方性理》作了注释，成《性理本经注释》。继刘智之后，又涌现出一批较著名的穆斯林译著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南京人金天柱，著有《清真释疑》。武昌人蓝煦，著就《天方正学》。云南人马启荣，著有《西来宗谱》。山东人唐晋徽，著有《清真释疑补辑》，等等。在清末译著活动中成就较显著的当数马复初，他所著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天方道行究竟》《会归要语》《据理质证》《朝规途记》等书，已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典籍。

经过清朝几代穆斯林学者的努力，被称作“汉克塔卜”的汉文译著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给一度处于“学人寥落”的中国伊斯兰教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辨模式和语言比较广泛研究整理了伊斯兰教义，从而塑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伊斯兰思想体系。同时应该看到，当明末清初穆斯林学者首次向国内翻译介绍伊斯兰哲学学说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体系，新旧学说与各派观点堆积在一起，而他们对其历史进程又缺乏全面了解，因此难以对翻译对象作出合理的选择、统一的安排，只能根据中国穆斯林的实际需要，各自从伊斯兰哲理的巨大历史堆积物中，抽取其中部分来作介绍。除了个别著作是原文照译，绝大多数作品属于摘译或编译。因此，仅读这些译著作品，很难了解伊斯兰哲理的全貌，也不能领悟其发展情况，可以说，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历史进程，在早期汉文译著中难以全面体现出来。

应该承认，翻译介绍宗教典籍本来就是艰难的工作，加之当时的穆斯林译著家对伊斯兰哲学各种学说的发展线索找不到全面可靠的范本，只有

在翻译原文之外再辅之以自己的阐述和见解，虽然这种类似佛学传播中“格义”的手法（即以自己所掌握的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为尺度来衡量比较外来经典）难免掺入作者情感，以致和原作多少有些出入，但其中也不乏犀利的思考和高超的见解。

清末以来，随着中阿文化交流的扩大，中国穆斯林学者接触到的阿拉伯文原著也越来越广泛，这不仅对反映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著作有了深入了解和比较，搞清了各种思潮和学派的源流，而且把视野扩及与伊斯兰有关的社会、法学、教育、历史、伦理等各种知识领域的著作中去。这就是伊斯兰教汉文著译活动在民国时期的发展轨迹。

（二）

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始有目的有系统地研究和翻译伊斯兰教著作，并为此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中国回教学会、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回教文化研究会、伊斯兰文化学会等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组织与团体。同时先后创办了《醒回篇》《清真周刊》《中国回教学会月刊》《伊光》《震宗报》《清真铎报》《月华》《正道》《人道》《晨熹》《突崛》《伊斯兰青年》《回教青年月报》《穆民》《金字塔》等200多种报纸杂志作为学术研究的阵地。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已能比较确切地反映原作要旨和风貌，如以王静斋选译《伟嘎业》（伊斯兰法学）一书为例，即以一种比较典型的范本为基础，在每段意思的下面收录了各种教法学家的不同见解，并根据其特点编排成序，供读者了解和比较，使人们读了以后，可以对伊斯兰教法的基本内容和历代学者们的理论依据有全面的认识。随着近现代中阿文化交流的扩大，反映近现代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思想的著作被译介至国内，推动了汉文译著的发展。除了对伊斯兰教原典的译介之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学者根据中国穆斯林的实际需要，自己撰述的伊斯兰理论著作，比如《伊斯兰教概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著作，比如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傅传统先的《中国回教史》，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白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等。另外，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译还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著译者中除了穆斯林以外，还有汉族学者，比如陈垣、陈汉章、顾颉刚等，以及基督教信仰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梅益盛。

从数量来看，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译远远超过了明清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读者需求量的增加和出版行业的发展。从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著译发展来看，由于受当时穆斯林社会的影响，穆斯林学者不敢轻易将伊斯兰教经典翻译成汉语，最显著的现象是《古兰经》和圣训在整个明清时期未能翻译成汉语，即使是张中、王岱舆等人的伊斯兰教著作，也是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被翻译完成的。而这种情形在马伯良《教款捷要》中表现得尤为明确，他的“不得已”体现在：其父“幼而失学（伊斯兰教知识），长而贸易”，及至暮年“有心回正道”，然“每与遵循教理之间轻重倒置，正偏不分”，“欲博闻强记不能得也”。在他看来，“非用汉文固不能启大众之省悟，纯用汉文又难合正教之规矩”。在这种情况下，他将伊斯兰教经典《母嘎玛特》用汉文注释，仅供其父阅览。后来有穆斯林发现了该译本，并将其刊印。在经过多次的修订后，才得以刊印完成。而他一再强调该书仅供“失学者便览”，并“非乐于令人习学汉文，而不习经文也”。从明清整个穆斯林社会来看，能够看懂或阅读汉文的普通穆斯林很少，而且很多著作都是在私下传抄或者借阅，这都影响了刊印的数量，从而也决定了汉文著译的社会效应。虽然清末以来，广东、成都、汉中、北京、镇江、南京等地都出现了专门刊印伊斯兰教汉文著译的机构，但刊印的数量仍然很少，这一方面是大众需求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受到刊印费用制约。清末以来，随着教育制度的变化以及新式教育的不断推行，接受教育的普通穆斯林越来越多，受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伊斯兰教汉文著译就成为他们学习和了解自身的宗教的重要途径之一。随后各地出现了新一轮伊斯兰教汉文著译刊印的热潮，这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伊斯兰教出版业的兴起。为了满足广大穆斯林知识阶层的文化需求，许多穆斯林知识精英在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著译基础上，著书立说，出现了一批新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译。为了使广大穆斯林接受新的思想和知识，这一时期又产生了许多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的清真书报社、成达师范出版部，

上海的中国回教经书局、伊斯兰文化供应社、穆民经书社，云南的振学社，等等。这些出版机构带着纯朴、务实的大众本色登上历史舞台，在沟通中阿文化，介绍和出版伊斯兰教知识和著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近代穆斯林出版事业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一些非穆斯林经营的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诸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也相继出版了大量伊斯兰教汉文著译，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马坚的《回教哲学》《回教哲学史》等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曾多次再版。商务印书馆在向中国社会介绍伊斯兰教，沟通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加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了解、互信、团结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老一代学者白寿彝、马坚等人的努力下，伊斯兰教研究得到初步开展，出版了一些代表性论著。真正的学术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随着伊斯兰教学术事业研究的初步开展，收集、整理、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文献成为一部分学人的想法。1987年，我和同事杨怀中先生成功申请到“七五”时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伊斯兰思想文化研究”，按照当时申请的计划，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还要完成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为了向国内外广大读者介绍中国伊斯兰文化宝藏中的精品——文献著译，我们全身心地投入伊斯兰教古籍文献的搜集工作中，同时也得到各地图书馆和热爱伊斯兰教汉文文献的个人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随后我们从国内的众多作品中选出较有代表性或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过影响的近580部文献著作。为了查阅方便，我们将其按内容分成17个类别，即《古兰经》学、至圣言行、教义哲理、礼制仪规、民事刑律、教派门宦、论辩释疑、概论纵览、时势社会、述闻纪行、科技文化、丛谈论集、歌词故事、启蒙常识、史志研究、新疆古籍、中阿交通。每个类别为一个部分。由于每个类别收录的著作均有其特定内涵，为了让读者把握其要义，了解这些作品的论述特点或时代背景，我们在每类作品前均加以简要说明。由于每一种入选著作的篇

幅和价值不一，因此在作提要时详略不一，但大致包括书名、定义、题解、著（译）者、写作年代、编写宗旨、著作经过、出版年月、版本情况、篇章目次、内容概略、序跋附录、著译特色、学术价值、社会影响等几个方面。1993年，我们的研究成果《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一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学界收集和整理伊斯兰教文献的同时，国家也非常重视古籍的整理和研究。1998年上半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下发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即将组织整理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通知，并于1998年5月在广西举办了由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人员参加、聘请专家指导授课“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培训班。回族古籍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一部分被纳入其中，列为“回族卷”。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撰写任务基本完成。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一些学者意识到影印出版伊斯兰教著作的重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相继出版了数套丛书，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燮藩研究员主持的《清真大典》、已故宁夏大学吴建伟教授主编的《回族文献丛刊》、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主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以及宁夏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搜集整理的《回族典藏全书》。据悉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正在搜集、整理《中国伊斯兰文献汇编》，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这些都是鼓舞人心的好现象。

虽然已经影印出版了大量的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文献，但迄今仍未见有研究性论著出现。自从整理出版《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以来，我一直有志于此专题的研究，自调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以来，行政事务占据了我大量时间，早年的研究设想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看到马景博士的这部书稿，我顿时倍感欣慰。

(四)

认识马景是2009年4月底，当时他持博士论文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希望我担任同行评阅专家，为他的博士论文撰写评语。尽管当时单位事务繁多，但是看到他论文的题目——《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研

究》后，我欣然接受了他的请求。经过一周的审读，按照他所在学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同行评阅书”的要求，我从论文选题、文献综述、论文创新点、写作规范、不足之处几个方面填写了自己的看法，大概如下。

论文选题方面，选题新颖，视角独特，属于开创性的研究，可以填补国内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文献综述全面，资料翔实，不仅查阅了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汉文伊斯兰教文献以及民国伊斯兰教报刊，而且查阅英文著作、报刊以及其他相关信息，基本上掌握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研究动态，前期的准备工作很扎实；与以往学术研究不同的是，论文把研究的范围界定在民国时期，不仅将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放在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下去探讨，而且将阿訇阶层、穆斯林知识分子、汉族学者以及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综合在一起，分析了汉文译著蕴含的思想主张及在当时社会的影响，突破了过去只研究穆斯林视野下的汉文译著；论文符合学术论文撰写要求，引文规范，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是一篇学术价值极高的博士论文；该文不足之处在于理论分析较少，主要侧重于对事实的分析和著译者个人思想的阐释，综合分析的能力有待提高。

时隔四年，马景再次持即将出版的书稿请我写序，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再次答应这位年轻后学的请求。据他介绍，2010年他以“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思想研究”为题，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13年初成果顺利结项。该书稿是在已完成项目基础上修订而成，内容比原博士学位论文增加了近一倍。看得出，在这四年里，他确实下了功夫，收集了大量文献，做了分析和归纳，并就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不足作了补充和完善。虽然书稿延续了原来的框架结构，但内容比原来更丰富了。的确，汉文译著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现象，不仅与中国的文化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直接关系。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在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尝试构建一个“民主共和”的时代，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不仅有明清时期的传统思想，而且具有现代的新思想、新文化，这就决定了民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译本身具有新的特点。

书稿首先梳理了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著译的情况，列举了学术界